

编者按:

如果说高考是千万考生“群雄逐鹿的杀场”,那么高考招生则已成为高校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在今年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名校之间生源竞争之激烈越发浮出水面,“掐尖大战”、“放鸽子门”、“口水仗”……诸多“事件”引发舆论特别关注。

为还原“招生乱象”背后大学的境遇,了解当前高考招生录取现状,并尝试探究未来可能的改革方向,本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教育专家、高校招生负责人。

高校“招生乱象”背后的现实与出路

□本报见习记者 郝俊



在现行高考体制下,除了考试,招生环节的透明尤为重要。

校新生的录取分数更加集中而整齐,无形之中加大了高校之间的差距,同时也抹杀了新生群体的多样性。“估分报考志愿是有风险的,分数很高的考生也可能被录取到一般院校。这对希望获得高分考生的高校来讲,是一件好事。”郑若玲进一步解释道。

除此,考试和招生未能分离,也被认为是我国高校无法突破“唯分数论”的重要原因。

据郑若玲介绍,美国、英国等教育发达国家,其面向高中生的大学入学考试均由民间考试机构统一组织,为考生提供考试成绩的同时,也会提供一份成绩分析报告。高校招生时,要求申请入学者提供包括考试成绩单在内的全面申请材料,考试成绩和分析报告将作为必备条件,但并不完全依据考分来决定录取与否。高中平时成绩、各种获奖证书、校长推荐信等,均可作为判断考生综合素质的依据。

综合素质评价有难题

“招考分离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经过实践检验是更科学合理的方式。”郑若玲认为,这

是高校招生录取发展的趋势,我国也正朝此方向努力。

对此,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则表示,全面考察综合素质以进行录取的设想虽好,但缺乏可操作性,很难有可以量化比较的刚性标准。

刘海峰指出,我国高校的招生录取文件中历来都强调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但实际操作中为什么会演变成完全“以分取人”?他认为这其中具有不得不然的原因,或者受到了某些规律的制约,“由于平时成绩可能作假,综合素质和表现难以量化而不具备可比性,推荐评价文字很难客观判断,因此,综合评价是一个不易实现的理想。只有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实验,取得成效后,综合评价才可能逐步推行。”

目前,高考分数被认为是最公平的竞争砝码,引入其他评价方式常常会引来对公平性的疑虑。例如北京大学推行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度引起热议,正是缘于对方案公平性的关注。

如何在保证公平的前提下推动改革?郑若

专访北大招办负责人:高考招生不只是高校的事

《科学时报》:高校在全国各省普遍设有“招生工作组”,请问在整个招生录取过程中,这个工作组在各地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各高校是否对其招生工作设有硬性指标?

北大招办负责人:招生工作组在各地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完成在当地的招生计划;二是向考生和家长介绍学校当年的招生政策、专业设置和学科特点等情况;三是指导考生合理填报志愿。学校对招生工作组只有一个硬性指标:完成招生计划。

当然,招生工作组也要为学校招收最适合各院系培养的学生,努力争取最优秀的生源。

《科学时报》:高校招生录取中是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现有的考试方式、志愿填报方式等,与招生制度不配套的表现有哪些?

北大招办负责人: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稀缺,这决定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到目前为止,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在坚持目前高考招生录取制度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更为合理的高考志愿填报方式。

在目前的所谓“招生乱象”中,有一种观点将其归结为高校招办错误地制定了争取优秀生源的硬性指标,认为只要取消了这些指标,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另一种观点将其归结为考生和家长错误地向高校提条件,认为只要考生和家长道德素质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学校,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都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

任何一个机构和个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受外部制度环境制约。这和道德水准无关。这些“招生乱象”主要发生在高考后知分

填报志愿的省市。在那些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省市,则没有发生。这说明,问题的根源可能出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上。它改变了考生和高校的行为方式。

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方式下,一方面,高校为了争取最优秀的生源,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确保目标学生能够填本报名。由于生源竞争关系的存在,谁也无法从这场博弈中脱身。当前,高校在招生中的所有做法都和这一方式有关。比如,和考生签订预录取协议,人为减少公布的招生计划,甚至只在某个省市投放一个招生计划等等。这是制度设计使然。

另一方面,考生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确保自己被某一高校的某一专业录取,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和高校谈判。由于考生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高校招生变成了一场依据分数高低进行的拍卖和交换。这同样是制度设计使然。如果高考志愿填报方式是考前或估分,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不知道考生分数的情况下,高校想去争取某个学生却没有目标;考生想去和高校进行谈判却没有资本。双方都没有对接的动力和途径。

《科学时报》:在招生过程中,高考分数是最直接体现生源质量的硬指标。在招生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评价指标来综合判断考生素质?在目前的高考体制下,有没有可能突破招生的“唯分数论”?

北大招办负责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依据高考分数录取是导致招生乱象的原因。如果有其他替代性指标来综合判断考生素质,就可以防止高考招生中的“唯分数论”。但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对一个人进行评价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即

使在西方国家,学生学业成绩仍然是高校招生的重要依据。在中国现阶段国情下,高考分数仍然是老百姓公认的“硬杠杠”。突破了这个“硬杠杠”,就突破了老百姓心里的底线,就会被认为不公平。

当然,我们不能把依据高考成绩录取直接等同于“唯分数论”。在高考分数之外,我们还要考察学生的理想抱负、社会责任感、好奇心和志趣等非智力因素。这也许是高校自主选拔录取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也是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所要探索的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选拔新模式。

《科学时报》:很多考生选择院校和专业时,在不同程度上有着“盲目性”。在您看来,高校招生部门是否能够对其进行更多的指导,以帮助他们更加合理地选择?在实际的录取过程中,招生部门是如何衡量考生专业倾向和适应性的?

北大招办负责人:在高考前或高考后估分填报志愿的省市,高校招生老师能够对考生报考志愿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导,帮助他们进行更加合理的选择。但在高考后知分填报志愿的省市基本上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一旦考生知道了自己的分数,当他来和你进行谈判的时候,高校就变成了弱者。你只能答应他的专业要求,否则他就转投其他高校。如果考生的专业选择是理性的,这也没有问题。但实际情况是,考生往往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对未来的规划,他只能依据社会上普遍的看法进行选择。于是,经济管理等所谓“热门专业”的“价格”被抬得越来越高,而一些基础学科或长线专业变得越来越无人问津。显然,这对高校学科建设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创新人才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每周短评

高分考生青睐港校的启示

香港高校内地招生录取7月7日正式结束,今年在内地共录取的291名学生中,有包括北京三名文科第一名在内的17名省、区、市级高考第一名。

近十多年来,香港的大学陆续对内地学生开放招生,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高中毕业后到香港读大学,高分考生放弃内地高校赴港求学早已不是新闻。今年北京三名女生同时获得高考文科最高分,又同时放弃北大而选择港大,这样的巧合更增加了这个话题的趣味性和关注度。

有评论指出,名校与优质生源的“联姻”,已经成为关乎内地高校声望和地方政府业绩的“硬指标”。然而与之相比,高分考生和家长们更关注的是其自身利益和发展空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曾直言,上香

港任何一所大学都比内地名校更值,因为这不是两所学校的竞争,而是两种教育体制、教育模式的竞争。高分考生越来越多地“弃北投港”,北大清华的光环逐渐褪色,显示了社会理性的逐渐清晰和成熟。

一些考生同样表示,目前内地高校在招生、课程设置、专业调整、学位授权、机构设置等方面还缺乏自主权,不仅制约自身发展的活力,而且导致了与香港高校之间的本质不同,就读港大就是要体验完全不同的教育体制。

如果说以各种“洋高考”为录取依据的外国大学让大多学生“望洋兴叹”,那么完全承认内地高考成绩的港校带来的竞争堪称干脆直接。不仅考生们由此获得额外的选择,也为内地高校的改革创新带来新的动力和契机。为了全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让港校带来的压力来得更大些吧!

(孙琛辉)

中国大学评论

再说南科大的“中国化”

□尤小立

两年前,还在南方科技大学高调筹建之时,笔者就曾撰文,谈南科大的前途不是“加州理工”而是“中国化”的现代大学(《南方科大,中国化现代大学的期待》,《科学时报·大学周刊》2009年9月28日)。当时,从社会到媒体,高分的叫好声浪,令笔者原本一个微弱的善意的提醒,瞬间高悬,成了“盛世危言”。如今,南科大的“中国特色”愈加明显,印证了笔者当初的担心,但面对从社会到媒体对南科大的诸多质疑,笔者愿意再次从大学“中国化”的视角谈谈南科大,以表明对当下中国大学改革过程中任何有价值的探索的支持。

其实,南科大真正的危机不在于它先期招收的学生是否参加高考,从而是否享有高考的豁免权。当然,以这种壮士断腕的方式,促使大学改革的深化,其精神固然可嘉,但方式上并不可取。至今南科大几十名先期录取的学生的命运,仍有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

南科大真正的危机在于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过分期待,并且过分乐观地期望通过对香港科技大学成功模式的模仿,迅速达成目标。因此,前不久南科大筹备组中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三位教授的突然辞职,并且突然在《南方周末》发表公开信,对南科大筹备过程中的种种不足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就很容易被看做是在釜底抽薪,进而让他们自己和南科大陷入到道德背叛和改革遇挫的双重漩涡之中。

冷静地看,社会转型到了一定阶段,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无奈选择的确应该被更加规范和理性的方法所替代。这也是三位教授批评南科大的理论依据。但问题在于,当下中国是处于应该规范或能够用理性方式的阶段,还是仍处于无法规范、不可能完全运用理性的阶段,并不明确。如果尚处于待规范和待运用理性的阶段,必然会引起人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紧迫感。这样看来,“骨子里都相信摸着石头过河”的朱清时校长,根据自身的经验,先抓住机,然后再走一步,通过进一步的方式,就显出了时代的合理性。

这里并不想论证南科大这次“内部地震”的孰是孰非,而是想说,一旦治学理念上有所差异,反映到办学上就可能出现势不两立或者南辕北辙。千万不要忽视这种急速变化的效应,因为它很可能让大学的元气受到伤害。伤筋动骨,百天不愈。这便是“折腾”。中国大学之所以经不起折腾,是因为它已经变得敏感脆弱。无论是有一定理念的领导者,还是没有理念的领导者,无论是大刀阔斧,舍我其谁,还是左右摇摆,朝令夕改,他们的共性便是誓不回头。这其实是制度缺失或者说“人治”不可避免的弊端的表现。制度比人强,所以,笔者一直提倡当代中国大学应该从体制入手,秉承协商民主的原则,一点一滴地改革。

朱清时校长最为可贵的精神是敢于创新,敢于直言,敢于担当和探索。但最大的局限,恕我直言,就在于他的经验中更多的是探索的历程而非完整的关于大学建设的规范理念。因此,他发表的文章和谈话中大多体现的是“特区经验”。这一点他自己也似有所悟,所以会有南科大的创办,成功了是榜样,失败了是教训的悲壮之言。

南科大董事会的组成以及党委的设置,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也许社会和媒体过多地听从了朱校长“去行政化”的呼唤,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将现实中国的大学真正地“与国际接轨”。但其实,面对“中国特色”的现实,南科大哪怕有特区政策的扶持,也根本不可能彻底地例外。

然而,在当下的大学急需深化改革的关键,在大学无一例外地需要负重跳舞之时,敢于创新,敢于直言,敢于担当和探索的品质,对一位大学领导者是着实难得的。因此,鼓励朱清时在南科大的探索,比讥笑南科大的“中国特色”更重要。

现在需要规范的是,如何从制度上对南科大董事会的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让它彻底有别于其他大学的业已存在的“董事会”。这是一个制度创新的突破口。另一个突破口是如何真正地落实校长负责制,并且在落实校长负责制以后,如何规范和防止校长权力的无边化。

我们过去常常说,改革允许失败。那是从最坏的结局上来的。现在,朱清时校长在筹建南科大过程中的改革还刚刚起步,根本谈不上失败,也根本没有到评判成功与失败的时候,我们何必那么悲观地预言或者幸灾乐祸地讥讽南科大一定成功不了呢?

“中国化”的大学并不意味着失败,实际上,中国办“中国化”的大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对于中国大学改革有什么评判标准的话,那只能是看它是不是真正提供了新的可资借鉴的方式和方向,它是不是真正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成长以及赢得老百姓的口碑。这个评判标准对于南科大同样也适用。

主编 崔雪芹
本版责编 孙琛辉